



社会建构主义与灾害治理： 一项自然灾害的社会学研究

周利敏

摘要：社会建构主义为灾害社会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范式转移”及“反省机制”，它主要有两个重要面向、六个基本维度和八个基本命题，建构要素包括建构主体、建构规则和建构话语三个维度，建构逻辑包括建构过程、建构表现和建构结果三个维度，前一面向是在论述灾害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后一面向则是基本分析框架，由此引发了“离灾”、非结构性减灾、风险治理、媒体责任、“隐性灾民”及不公平结构根源等重要治理启示。这一理论取向具有动态研究、从自然外部拉回社会内部、从悲观受害者向积极行动者转变等理论优势，但同时也存在着完整分析框架缺乏、实证研究困难、互构过程模糊、理论机制与逻辑关系不明、化约为权力与政治运作逻辑及对科技滥用意识形态批判等局限。

关键词：灾害；社会建构主义；功能主义；社会脆弱性；灾害社会学；灾害治理

在当代，全球气候诡谲多变，气象灾害、生态灾害、社会灾害及自然灾害不时发生，人们似乎步入“风险社会”或“灾害社会”年代，学界需要反思、调整和修正灾害研究理念、视角与方法加以应对，“社会建构主义”这一具有“自我反思性”特征的新范式因此逐渐兴起并成为学术主流。大致说来，目前灾害社会科学可以分为两种形态，第一种是特定灾害研究取向(hazard-specific approach)，这是传统的研究形态，主要根据灾害本质不同而研究特定的应对策略；第二种是普遍灾害研究取向(all-hazard approach)，主要针对不同本质的灾害而发展相同的因应程序。近年来，灾害研究逐渐从特定取向迈向普遍取向，呈现学科交叉和视角多元趋势。基于此，本文试图回答几方面问题：第一，如何清晰呈现社会建构主义理论框架及基本内涵，使之不至于流于“我思故我在”的思辨形式？第二，如何将社会脆弱性、非结构性减灾、灾害风险、集体行动和灾害话语等前沿议题整合进建构主义分析框架，使之从单一性研究迈向整合性研究？第三，如何搭建社会学、管理学、政治学和传媒学等学科之间的对话平台，进而对灾害进行全面与深入的分析？第四，这一理论取向对灾害治理有何启示？第五，它有哪些优势，又存在哪些局限，如何正确认识其解释力和界定适应范围？

一、“回笼效应”破解与建构主义兴起

近代社会以来世界范围内重特大灾害频频发生，引起政府、学界和社会各界强烈担忧和高度关注。在 1908 年到 2008 年一百年间死亡人数最多的世界十大重大灾害中，我国就占了将近一半 (Udomratn, 2008: 441-444)，如 1920 年北方大旱、1920 年甘肃海原地震、1928—1929 年陕西大旱、1943 年广东大旱和 1976 年唐山大地震等。进入 21 世纪以来，几乎每年都遭受重大灾害的侵袭，如 2008 年南方冰雪灾害、2008 年汶川大地震、2010 年

青海玉树地震、2010年甘肃舟曲泥石流、2011年上海“海葵”台风、2011年北京暴雨、2013年雅安地震、2013年台风“海燕”及2014年云南鲁甸地震，灾害似乎逐渐变成人类生活的常态，这些看似“完全自然”的灾害实际上包含了许多人为因素。我国自古以来就有“人祸诱发天灾，天灾加剧人祸”的说法，二者常常相互转换甚至激化，1556年发生数十万居民丧生的陕西大地震导致“饥民遍野，饿殍塞途”，最后集结为流寇揭竿起义，明朝政府也因此走向穷途末路。1970年孟加拉遭受台风侵袭，死亡人数多达20万，促使该地区脱离巴基斯坦统治而宣告独立。1980年意大利南部的一次大地震使全国经济萧条，从而导致了政府垮台。社会学家贝克(Beck)指出如果不重视灾害被人类社会建构的现实，不仅会造成大自然反扑，而且还会产生“回笼效应”(boomerang effect)(Beck, 1992)、陷入“重建—破坏”的无限循环及无法走出“灾害社会魔咒”，最终令建构一方身陷其中而付出惨重代价。

1963年，美国学者夸兰泰利(E. Quarantelli)、哈斯(J. E. Hass)和戴恩斯(R. Dynes)等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创建了“灾害研究中心”(Disaster Research Center, 简称DRC)，被称为灾害社会科学研究“苗圃”(seed bed)。1976年，美国学者怀特(F. G. White)和哈斯(J. E. Haas)在科罗拉多大学创立了“自然风险研究与应用中心”(Natural Hazards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Center)。在这两个中心的带动下，灾害社会学取得了长足发展，主要形成了三种理论取向：

首先是功能主义(functionalist approach)取向，它主要是将社会学主流理论与灾害研究进行对话，认为社会和社区都是重要的社会系统并担负着重要的社会功能，但经常会因为天然或人为科技灾害中断或瓦解(Bolin, 1998: 272)，其主要理论视角有“结构功能主义”(structural functionalism)、“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社会支持”(social support)、“社会过程模式”(the social process model)、“社会生态学”(Social ecology)及“符号互动论”(symbolic interactionism)等(Tierney, 2007: 503-525)，灾害人类学研究也属于这一范畴，这一取向是早期研究的重点，直到今天，在灾害社会科学尤其在防灾、备灾及灾害应变等领域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其次是社会脆弱性分析(social vulnerability analysis)，通过将自然科学领域中的脆弱性概念引进社会科学领域而与前一理论取向有明显差异。它与自然脆弱性也存在明显差异，前者认为“脆弱性源于人类自身”，致力于探讨社会经济、社会阶层和社会地位对受灾风险分布及灾害冲击的重要影响，后者认为“脆弱性源于自然结果”，立足于自然科学及工程技术角度。社会脆弱性主要有五种分析视角，即风险—灾害模型(risk-hazard)、政治—经济型、压力—释放模型(presure-and-release)或压力—状态—释放模型(presure-state-Response)、整合型和恢复力分析模型(resilience)，主要探讨灾害风险形成的社会因素或从单一灾害结果寻找多种社会因素，这一理论取向是当前研究的热点和重点，主要在灾害冲击预测、评估民众如何适应及加强能力应对风险威胁等领域具有广泛的适应性。

最后是社会建构主义取向(social constructiionism approach)，20世纪80年代以来，它逐渐成为灾害社会科学领域最受学界关注的新范式，试图克服前两种取向的研究局限并同时整合其优势。建构主义有六种不同类型即社会文化认知观(socialcultural cognition)、激进建构主义(radical constructivism)、社会建构主义(social constructivism)、控制论系统(cybernetic system)和信息加工建构主义(information processing constructivism)。灾害社会建构主义则主要有五种视角：一是风险社会建构论，又分为三大学说，“反思现代性学说”在本体论上将风险分为主观与客观两种形态，着重探讨二者的相互关系及建构意涵。“文化象征学说”并不否认风险客体存在的事实，但更强调主观风险和风险意识是由社会建构的。“统治形态学说”将风险看成是由意识形态、权利关系、国家、社会及象征意义建构而成的认知问题。二是社会定义论，埃里克森认为灾害发生原因和损失都是“被社会定义的”(Erikson, 1976)。三是社会互动论，布里顿认为灾害是社会的产物，灾害存在与否依赖于人类自身活动与自然世界的互动关系(Britton, 1986: 254-271)。四是媒体建构论，汉森指出在建构社会大众对灾害认知上媒体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Hansen, 1991: 443-45)，基维库鲁探讨了媒体制码者建构了哪些意像与意涵，而解码者又是如何拆解符码意义(Kivikuru, 2006: 499-520)。五是灾害社会调查文化主位建构主义(Culture-emic constructivism)，它认为研究者本身也参与了灾害事实的社会建构过程，主张在社会调查中从被研究对象即文

化主位视角出发,着重了解灾民的经历、感受、思想和话语,解构权力中心主义、精英主义和主体性事件的灾害调查立场。社会建构主义取向适合公共风险研究、灾害形成过程中人的主观能动性及其与社会互动关系等一般性研究等。

如果说灾害社会学研究焦点是考察灾害与社会的互动关系,那么社会建构主义应成为最不可或缺的视角。灾害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人”的存在,例如火星经常发生异常活动,但与人类无关而不存在灾害一说。在一个无人岛上出现火山爆发、飓风侵袭、严重地震和海啸等现象,也只能被看成是剧烈的环境变化而不是灾害事件。人类建构了社会,也建构了灾害,翰威特因此指出如果不对社会或社会一部分造成影响,就不能算是灾害(Hewitt,1983:304)。对于灾害研究来说,如果不将社会纳入其中,那么极有可能复制从前观点而错误地看待灾害。吊诡的是查阅中国期刊网专门从建构主义视角对灾害进行深度研究的论文还未曾见过,只有一些散落在其他主题中(如风险)的零星研究,大多停留在思辨状态,似是而非,与实际内涵相去甚远。由于研究视角独特性、适应范围宽广性和解释力强大,建构主义在其它领域得到了广泛重视和应用,如教育学、政治学、哲学和心理学等领域,灾害社会学迫切需要加强这方面研究。

二、理论框架与基本内涵

社会建构主义理论框架有两个重要面向和六个基本维度,基本要素面向包括原因建构、话语建构和观点建构三个要素,这是在论述灾害与社会的互动意涵,建构逻辑面向包括过程建构、表现建构与结果建构等三个部分,形成了较为明显的建构过程(如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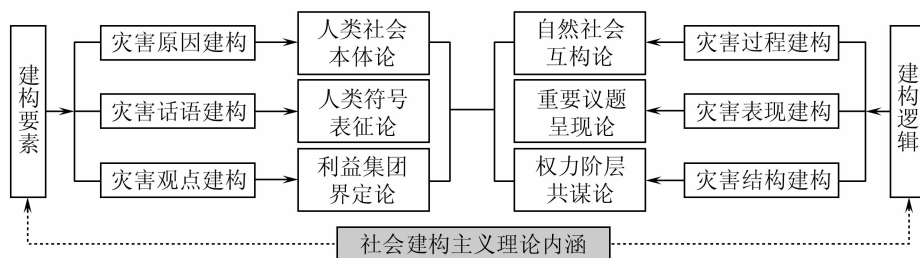


图1 社会建构主义理论框架图

(一)灾害原因建构:人类社会本体论

当人们在侵蚀的山坡上大兴土木或在地震带盖房屋时灾害种子就此埋下,不当开发、环境破坏和灾害风险不公平分配等因素是灾害形成的重要原因,“出乎意料”之外的灾害背后隐藏着人类社会的影子。怀特因此认为自然灾害的发生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它来源于人类社会系统本身的脆弱性或者社会系统自身的弱化(White,1974)。我国自古以来就有“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看似自然形成的灾害实际上包含着复杂的社会阶级、权力关系和社会结构等因素(Ortner,1984:138-142)。斯托林斯因此强调所有灾害都是社会性的,它是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因素建构而成并非只有物理性因素,灾害冲击会使社会结构混乱或者使社会原有全部或部分功能丧失,它对人类社会体系的冲击和社会秩序的干扰则成为研究焦点(Stallings,1998:136)。因此,灾害研究应以人类社会为主体,对灾害发生地区社会群体历史脉络、社会背景及文化现象等层面进行深入研究,才能把握灾害发生的真正原因和内在本质。

(二)灾害话语建构:人类符号表征论

灾害话语体系是经历者、聆听者和传播者共同建构的结果,它是符号表征、话语结构、价值取向与想象图景共同缔造的产物。首先,有关灾害的多种“恐惧隐喻”是人们不断接受灾害话语,不断被固化和自我规训的结果。在“恐惧隐喻”中,人类被置于恐惧和被伤害的主体位置,尽管使用“防灾”、“抗灾”和“减灾”等主动性字眼,但并不能改变被建构的事实。其次,无论是亲历的还是转述的都是对“灾害事实”的再呈现,是当事人对“事实”加工后形成的灾害图像,也是各种不同视角和发声位置建构的事实,它建构了灾害发生后会有抢夺(looting)、社会解组(social disorganization)和越轨行为等“灾害迷思”(Wenger & Friedman,1986:27-50)。最后,话语论述带来的“山崩地裂”和“家毁人亡”是一种“灾害事实”呈现,“震撼

天地”、“振奋精神”及“英雄叙事”则是另一种呈现,前者是负向的社会建构,后者是正向的社会建构。

(三)灾害观点建构:利益集团界定论

究竟是谁制造了灾害观点,又是谁要承受灾害后果?斯托林斯指出地震强度、威胁、冲击和管理策略是由政府、慈善团体、资本家、工程师、地理学家、地震专家、技术官僚和私部门混合在一起的利益集团共同决定的,灾害问题是否与如何纳入公共议程及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方式都是他们决定的,这些人有组织、有意识地通过媒体报道和观点论述(discourse)形塑了灾害事件,这一过程被称为“地震制造”(earthquake establishment)(Stallings, 2002: 281-306)。社会建构主义认为有关灾害的看法不在于客观真理性,而在于任何观点如果出自或通过专家和政府系统就成为主观建构的现实。同时,由于灾害摧毁了既有的制度安排与陈旧的社会建设,留下了一张全新的“发展白纸”,可以任由利益集团“图抹绘画”,他们借此机会制定和主导了灾后重建规则。因此,灾害研究不只是揭露客观发生的灾害事实,也不仅反映灾害造成的重大社会冲击,更要强调复杂的权力关系、行政组织、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嵌入其中。

(四)灾害过程建构:自然社会互构论

灾害的发生导致了社会变迁,社会变迁又增加了环境脆弱性,当二者错综复杂交织在一起时就会对道德、经济和传统观念形成重大冲击。亚历山大因此指出灾害不仅是一种偶然事件,更是一种“动态社会的结果”(Alexander, 1993)。一直以来,人类生存空间与行为并不完全被自然环境所主宰,两者之间一直维持着多元、持续及互动的过程,只是人类不断危及和破坏这种关系(Ingold, 1992: 39-55),克累普斯因此指出人类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Kreps, 1998)。人类对自然环境的过度干预反而降低了适应环境的能力,干预越多环境破坏就越严重,人类适应环境的能力会随之下降。现在人们已经不太担心自然会对社会怎么样,反而担心社会对自然做了什么。此外,灾害观点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在每一次与社会的互动过程中不断地被重塑、改变和替代。灾害社会建构过程论使人们诠释和认识灾害的方式得到很大改变,即灾害不是静态存在的客观事实,而是一种动态的社会过程,灾害背后隐藏的复杂社会关系被进一步凸显出来。

(五)灾害表现建构:重要议题呈现论

建构主义认为灾害是社会系统应对极端事件失败的“正常”表现,社会脆弱性、非结构式减灾、灾害风险、集体行动、媒体话语、灾害概念和灾害认知等都是社会建构议题的具体表现。以社会脆弱性为例,它将灾害看成是社会因素造成的脆弱性与危害暴露程度(exposure)互动的结果,它不仅关注灾害本身特点,更强调脆弱性在灾害发生前已被既存的社会因素或社会特质所建构,这些特质包括性别、职业、阶级、族群、移民身份、信仰、习俗、房屋质量、保险能力、获取资源渠道、贫穷、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等,灾害不过是将这些隐性特质显性化而已。灾害风险也是人类与自然共构的结果,由于不同社会群体、个体与自然关系并非独立于社会,经常受到社会经济条件的限制,这使得自然作为一种机会或风险往往以一种不公平方式分配。社会风险因素既包括不同的政治经济因素,也包括人类不当开发和环境破坏等因素,这些可称为“风险扩大器”(risk amplifier)。

(六)灾害后果建构:权力阶层共谋论

建构主义认为灾害是统治精英维持政治和经济秩序危机的结果。首先,权力阶层形塑了灾害。“天灾”的产生是权、势、财、技等不同硬实力建构而成的,他们将自己制造的危机转化为某种灾害风险,弱势群体则被简化、被迫接受了等待救援、无助且被动的“灾民”形象。其次,灾害对于普通民众而言意味着生命和财产的严重损失,对于资本主义利益集团而言则是掠夺的难得好机遇,克莱因指出他们趁机利用社会治疗集体创伤时机推行解除管制、扩张资本、刺激市场、推广私有化和扩大占有率等措施(Klein, 2007)而大发灾难财,可称之为“灾难资本主义”(Disaster Capitalism),这是全球结构性灾难产生的根源。最后,权力阶层通过“共犯结构”、“有组织不负责任”(organized irresponsibility)和“共谋”推卸了灾害后果。一些政府打着“人定胜天”的口号,无视自然规律和环境保护,在灾害潜在区强行推行开发政策。同时,一个开发方案如果盖上百个章就表示责任相对递减,由此所带来的社会成本和社会后果则由全体民众承担,民众被动卷入权力阶层精心构建的“共犯结构”中。

这一理论框架核心是将自然灾害视为社会建构的产物而不仅是客观事实,灾害风险来自社会薄弱环节,真正意义上的“自然灾害”是不存在的,它主要有八个基本研究命题:

命题1:“灾害观点建构命题”,灾害发生原因、产生后果和减灾手段是有组织、有意识的“观点制造”(claims-making)过程,灾害发生原因及受冲击大小也由此界定。

命题2:“灾害情境建构命题”,政府通过灾害信息解释、专家诠释和形象管理等方式对灾害情境进行正向建构,政府救灾行动才有功劳可言。反之,灾民就会将矛头指向政府。

命题3:“风险不平等建构命题”,由于阶级、族群与性别等因素的存在,使得同一地区不同个人与家庭受灾风险呈现出的不平等现象。

命题4:“社会分化建构命题”,如果重建资源无法有效和公平分配,弱势群体的脆弱性会进一步提升,灾前阶级、族群或性别等社会不平等现象在灾后将会更加恶化,社会群体会进一步分化。

命题5:“媒体灾害建构命题”,在不可预测、不确定和不连续的灾害混乱现场,媒体紧急制作出来的“事实”是模拟、再现和拟像的,灾害真相已被诉说、被书写与被隐退。

命题6:“工业化减灾神话建构命题”,人类减灾能力与工业化并不是同步发展的,工业化程度越高,减灾能力未必越强,任何工业化弥补不了对自然环境的破坏,过度工业化促使了“自然向社会反扑”现象越来越多。

命题7:“结构式减灾绝对有效性建构命题”,如果过分强调自然科学减灾,忽视社会结构性因素及不与“处于危险中”的社会进行合作,减灾效果不仅不明显,而且使用得越多损失越大。

命题8:“灾害后果共担机制建构命题”,利益集团在灾害发生过程中对社会经济发展进行精心策划和隐性掠夺,利用法律和科学等作为辩护利器,以分散权力阶层政治风险和社会风险。

三、应用表现及实例诠释

社会建构主义在灾害研究运用中不像哲学那样抽象,也不像某些理论外表精致但应用范围狭窄,它能对当前灾害社会学许多重点和热点议题做出独特、全面而又极富解释力的分析,接下来尝试运用这一理论并结合一些典型案例进行深入研究。

(一)社会脆弱性建构表现

社会脆弱性具有明显的建构特征,它是指群体、组织或国家暴露在灾害冲击下潜在的受灾因素、受伤害程度及应对能力的大小,包括灾前潜在社会因素建构的脆弱性、灾中受害者伤害程度所反映的脆弱性和灾后受害者应对灾害能力大小反映的脆弱性(周利敏,2012:20-28),具体由三要素组成:即暴露性(exposure)、敏感性(sensitivity)和恢复力(resilience)。张倩从牧民暴露风险和脆弱性角度对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荒漠草原嘎查进行了研究,但没有涉及社会脆弱性的建构内涵(张倩,2011:11-19)。周利敏对社会脆弱性范式进行了详细研究,但同样缺乏对其建构性特征进行分析(周利敏,2012:20-28)。社会建构主义不仅需要关注人类有无能力处理灾害事件的能力,而且强调人类社会如何建构及解构脆弱性(如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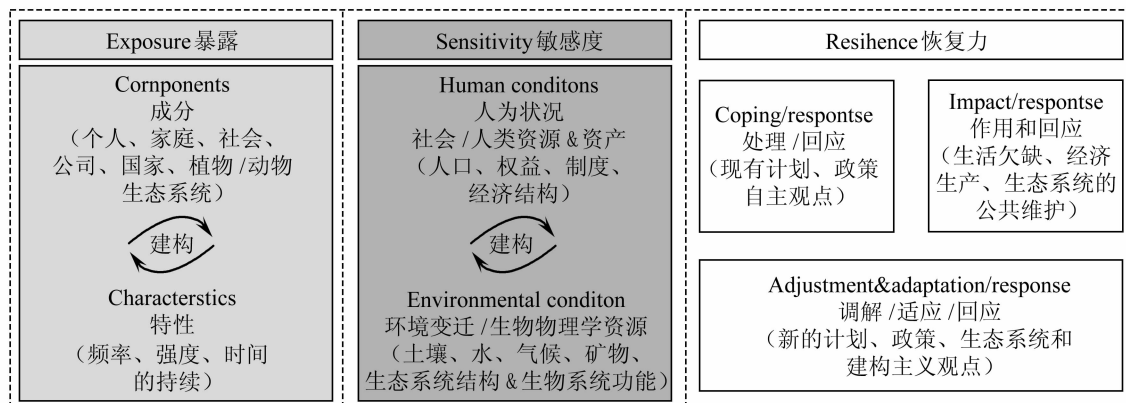


图2 社会脆弱性中的建构主义意涵

卡特发现社会脆弱性指标中最被人们认同的是年龄、性别、种族、教育、社会地位及经济收入等 (Cutter, Bofuff & Shirley, 2003: 242-261; 如表 1)。根据命题 3, 女性脆弱性较高, 这是由于其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偏低所导致。在汶川地震灾害救助过程中, 一些村民根据所谓的“常规”即外地媳妇如果没有本村户口, 就没有“资格”参与救助物资的发放, 这使得原本就脆弱的妇女在灾后更加脆弱。在阶级观较强的国家, 阶级低的族群相对脆弱, 而且不同族群之间的风险也具有明显差异。在芝加哥热浪中, 黑人社区死亡率是芝加哥市平均死亡率的 5 倍, 而拉美社区死亡率仅是芝加哥市平均死亡率一半左右 (Klinenberg, 2002)。2005 年卡特丽娜飓风对世界上最富裕国家中的最贫穷和最弱势群体造成了巨大影响, 低九区和欲望/佛罗里达社区是最贫穷和最弱势的两个街区, 它们被彻底摧毁。而且, 灾后少数族群如非法移民不仅需要面对生命财产损失, 还需要处理身份问题, 结果造成失业率与迁出比率偏高, 卡特还发现非英语系民众可能因为沟通问题而无法正确应变或无法及时获取灾害信息 (Cutter, 1996: 525-536)。

表 1 社会脆弱性因子指标描述及建构性意涵

概 念	描述或解释	脆弱度较高的族群
社会 经济 地位 (收入、政治权力、声望)	保险理赔、社会安全网络及授权的计划可提高社区居民应对灾害冲击的能力, 并加快复原速度	低社会经济地位
性别	女性较男性难以从灾害中复原, 因为在特定行业工作、较低的收入以及负担较多的家庭照护责任等	女性
种族与人种	种族歧视加强了文化和语言障碍并影响灾前资金捐助	非社会主流族群
年龄	如幼儿遭受灾害冲击, 父母必须花费更多时间和金钱来照顾, 而老年人因为行动不便, 必须花更多时间照顾, 因此缺乏恢复力	老年人、小孩
工、商业发展	工业与商业建筑的质量、密度与价值是社区财富的表征, 他们在灾后也需要较长的时间来复原	高密度、高价值
雇工流失	潜在的雇工流失使社区失业率恶化, 需要较长时间恢复	雇工流失
都市或郊区	郊区居民由于收入较低或从事土地性生产而有较高的脆弱性, 城市因为高密度建筑使得民众撤离更加困难	都市、郊区
居住房屋的结构	房屋的质量、密度与价值会影响灾后恢复能力, 例如海岸边的房屋必须要花很多的钱才能重建, 流动房屋很容易被摧毁	流动房屋
基础建设和救生网络 (lifeline)	下水道、桥梁、供水、通讯和交通等设施如果被破坏会增加灾害损失, 有些社区因为基础建设的破坏而无法重建	广阔的基础建设
租客	租客较房东有足够的资金援助, 极端的例子是当所租房屋变得危险或太贵时, 租客根本没有其他避难场所可供选择	租屋者
职业	依赖土地生产的农民或渔民比较容易受到灾害的影响, 自耕农或自耕渔民可能因此失去生计而转向低收入的服务业 (例如: 家管、保姆和园丁等)	劳工或办公室员工、服务部门员工
家庭成员结构	家庭中如果有较多抚养的人口, 或者是单亲家庭, 必须花费更多时间照顾家庭成员, 因此灾害复原力较低	高出生率、大家庭、单亲家庭
教育	高教育程度者即有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 可以得到较多的防灾信息, 低教育程度者较难获得灾害信息及灾害恢复的救济资源	低教育程度者
人口成长	人口快速增长地区缺乏足够优质的住宅, 而且社会服务网络不能实时针对快速增长的人口作调整, 新移入者因为语言不熟悉而难以获得和当地官员沟通机会, 因此得到救助资源的机会也较少	人口快速成长地区
医疗服务	内科医生、居家护理、医院密度高可以帮助灾区快速复原	低密度的医疗
社会依赖的人口	完全依赖社会服务的民众, 早已是在经济和社会层面被边缘化的人, 他们在灾难来临之前需要更多的援助	高社会依赖
有特殊需求的人口	无家可归的人、老年体弱者等难以通过统计定义的人口, 常在灾害中受到严重伤害, 也是灾害复原中最容易被忽略的一群人	大量有的特殊需求的人口

根据表 1 和命题 4, 社会脆弱性高的群体具有几个明显特征: 第一, 多为居于危险区域的人口 (living in places at risk); 第二, 多为被社会剥夺者 (socially deprived); 第三, 多为缺乏获取信息能力及缺乏参与决策机会等, 这表明了社会等级决定了人们承受风险冲击能力的差异。1998 年, 米奇飓风席卷了

洪都拉斯,最贫穷家庭在暴风雨中丧失了约 1/3 的财产,最富裕家庭仅损失了 7% 的资产。1998 年孟加拉国遇到了百年难遇的洪灾,洪水消退 15 个月后发现 40% 最贫穷家庭债务平均达到了家庭月开支的 150%,这是洪水前的两倍。在 2013 年强台风“海燕”中,由于菲律宾国内贫富差距过大、贫民住所多为简易木房及人口激增等因素,使得受灾地区社会脆弱性不断增加。此外,预警与撤离等预防系统的差异也使得豪宅比贫民窟能更好掌握自我保护与逃难的能力(Cutter,2003:1-12)。

(二)非结构式减灾建构表现

在减灾领域中一直重视的是结构式减灾(Structural mitigation),它强调依赖人类工程技术发展过程及严格执行防灾技术标准,这些年来这一减灾效果不仅不明显,灾害损失反而有日益增加的趋势,结构式减灾迷思与神话正在被逐步打破。根据命题 7,非结构式减灾(non-structural mitigation)才被认为是降低未来天然灾害损失的有效手段(Kundzewicz,2002:3-13),已成为西方减灾领域的前沿议题,它将减灾视为人们主观意志建构出来的“客观现实”,致力于探究导致灾害产生和变化的那些非自然和非工程技术的社会建构性因素(如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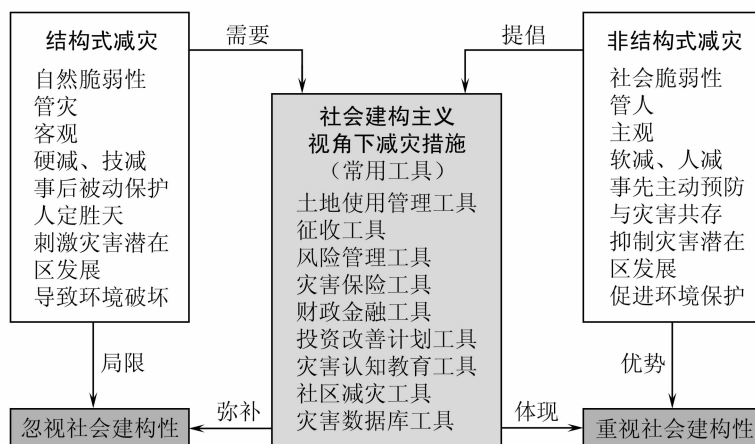


图 3 非结构式减灾的社会建构主义意涵

非结构式减灾反映了从自然属性向社会属性、从技术决定论到社会建构论的重大转变:首先,它坚持以“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作为基本理念,认为目前科学技术无法阻止自然灾害的发生,而且还具有延迟发生时间、道德风险、破坏生态环境和对抗思维等局限(Burby,1998:29-56)。20 世纪 60 年代修建的黄河三门峡水库由于对水沙运动规律缺乏认识,忽视了河道输沙输水的自然特性,建成后不久就出现库区严重的淤积现象,直接对上游渭河和西安等城市的防洪安全造成严重威胁。与此相反的案例是 2014 年 8 月 3 日,在云南鲁甸县地震灾害中,震中龙头山老街所有建筑几乎全部变成了废墟,只有修建于 1949 年的龙头山供销社三层木楼巍然屹立,当时睡在底楼的两个小孩因此躲过一劫。其次,根据命题 6,水泥建筑和科技文明使普通民众产生了错误的安全感,事实上堤防建得越高代表的风险就越大,可称为“堤防效应”(levee effect)(Tobin & Montz,1997:388)。人类建造的大堤与大坝究竟是一座丰碑还是墓碑,这是悬在人们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1975 年 8 月 8 日一场大暴雨导致河南板桥水库崩溃,随即如多米诺骨牌效应一样,引发了豫南地区石漫滩水库和宿鸭湖水库等 60 座水库接连溃坝,损失惨重,死亡数字至今不明。2005 年 8 月,新奥尔良卡特丽娜飓风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飓风伤亡,这是因为结构式防洪减灾措施完全被摧毁,1,500 多人失去了生命,20 万所房屋被摧毁或破坏,78 万人流离失所。最后,现代化侵占了原本属于大自然的生态空间,出现了“人与林争地”、“人与河争道”及“人与海对抗”等现象,“人造土石流”、“人造山崩”、“人造坍方”、“人造水灾”和“人造火灾”等一系列灾害因此产生,人类才是自己最大的敌人,非结构式减灾因此特别强调管人比管灾更为重要。

(三)灾害风险建构表现

建构主义认为风险是意义、逻辑和信念建构而成的产物,而不仅仅是一种外在事实。蒂尔尼提出

“风险客体”(risk objects)概念(Tierney,1999),认为它是文化、组织和权力建构的产物。建构主义并不否认危险源的客观存在且没有任何特定价值取向,但是人们对风险的感知过程受社会因素影响,它们共同作用于危险源,并通过复杂的社会过程影响风险感知和风险评估。卡斯珀森等人发现媒体报道风险信息方式影响了公共风险感知(Kasperson,1988:32),导致了风险放大或风险扭曲(risk distortion)情形出现。在现代社会中,风险结构从自然风险主导逐渐转变为人为不确定性风险主导。2012年7月21日北京遭遇历史上极为罕见的暴雨灾害,造成了79人死亡和巨大的经济损失,如果暴雨能够顺利进入地下排水管道或者被湖泊和土壤所吸收,这一灾害风险或许就能避免。风险扭曲分为风险放大(risk amplification)和风险过滤(risk filtration)两种类型,前者通过社会建构后风险被进一步放大,后者是错误认识风险产生、低估风险程度及感知部分风险(如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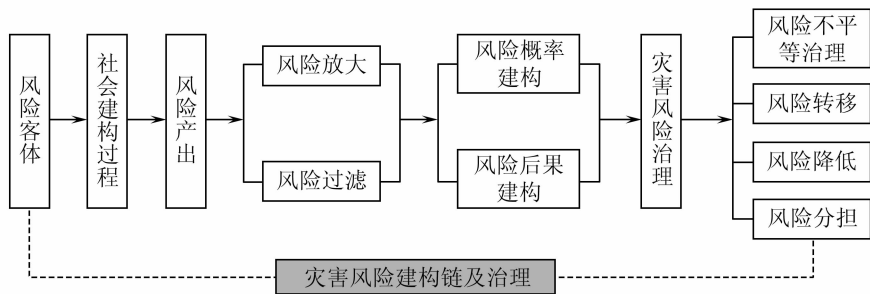


图4 灾害风险社会建构意涵

利益集团往往利用风险过滤和风险扭曲机制达到政治目的及获取经济利益,从而导致“天灾人祸化”及“人造天灾”现象频频出现。戴维斯认为美国加州马里布(Malibu)火灾看似天灾,实际上却是人为制造结果(Davis,1998),加州政府不顾自然生态、忽视气候模式、缺乏法制规范及错误开发等,使得这一地区灾害风险不断增加。1975年河南板桥水库工程是大跃进时代粗制滥造的产物,由于工程质量粗劣及日常疏于维护,当洪水爆发时,17个泄洪闸只有5座能正常开启,水库管理人员在没有得到上级命令的情况下,不敢大量排水泄洪,加快了板桥水库水位暴涨速度,灾害风险被无限放大。根据命题8,一些地方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口号下,通过“风险过滤”机制制造了“乐观暴力”,即高估效益和低估风险,在灾害潜在区域进行高密度、高强度和高风险开发,投资者也以“科技万能”和“配合政府发展经济”口号俘虏了民众,绑架了政府,肆意在“不可建而建”地区投资、开发和运营,民众则被迫卷入“不可居而居”的境地。2010年7月9日湖南省龙山县桂塘镇特大洪水灾害发生原因是地方政府为了追求经济发展和加强城镇化建设,根本就没有考虑防灾减灾事情,在商品房开发与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吞并河道,新修的公路不仅缺乏排水涵道,还远远高出街道路面。

(四)灾害情境建构表现

重大灾害发生后,不但会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严重财产损失和建筑物受损等直接损失外,还会造成既有社会秩序和社会规范中断等间接损失,灾民希望通过搜寻、整理和诠释信息来稳定情绪,灾区内的集体行动因此形成,这一行动分成三个阶段,即搜索信息、定义情境和咎责阶段,其中定义情境阶段分为骚动(milling)、定调(keynoting)及紧急规范(emergent norms)形塑等过程(Schneider,1992:37-136)。根据命题2,在定义情境过程中政府需要通过积极的情境建构以避免灾民抗争性集体行动的出现,同时专家与学者也需要重视灾害情境定义,利用其特殊的社会身份对民众灾害认知产生明显的引导作用,一些强势观点逐渐完善而成为支配性情境定义,引导灾区产生临时规范以克服常态规范失效引发的社会失范,一些弱势观点则被淘汰。如果疏忽情境定义的情况就会出现灾民寻找责任主体的集体行动即咎责行动,导致“天灾”向“人祸”情境定义转变,灾民就会对政府所代表的人为系统进行强烈谴责以宣泄负面情绪(如图5)。

在1995年芝加哥热浪中,官方调查结论是一些关键的自然因素罕见地聚合在一起导致了气象事故(Klinenberg,2002:15-16),它被定义为一场意外的自然灾害,一场超越了公共机构和人为因素所能控制的灾害。2010年云南出现百年一遇的“秋冬春连旱”,一些地方官员认为是“天灾”所致,也有民众和媒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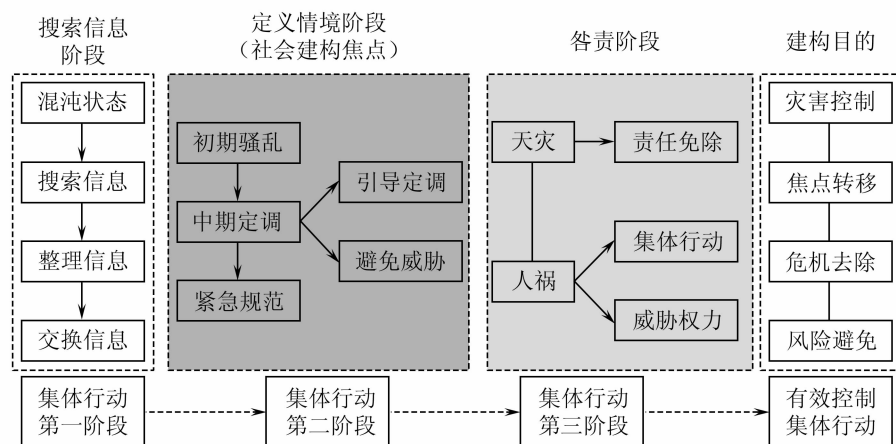


图5 灾害情境定义的社会建构过程

认为是“人祸”造成,是人为因素使云南一带土地失去了绿色植被覆盖和保护。2011年7月15日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县突降暴雨发生山洪灾害,造成一辆中巴车13人死亡6人受伤,地方政府定义为泥石流这一自然因素造成的,死者家属和社会大众则质疑为“人祸”因素,称只需一块警示牌就能避免惨祸发生。政府一般会建构积极的和正向的情境定义,将灾害责任导向“天灾”和转移给“无声的自然”,以达到维护政府决策正当性、组织利益和政治权威的目的。

(五)媒体灾害报道建构表现

蒂尔尼认为人为开发因素、知识宣称及定义是灾害形成的主要原因(Tierney,2007:503-525),根据命题5,大众媒体在灾害知识宣称(如什么因素造成灾难发生)及定义上扮演着关键角色,灾害虽然是真实发生的事件,但是人们对灾害的图像建构(mapping)与认知则受媒体再现的形塑(Singer & Endreny,1993:3)(如图6)。美国加州火灾时有发生,尤其是旅游胜地圣塔巴巴拉县(Santa Barbara)等屡遭火灾侵袭,主要是当权者灾害论述的支配性力量及相关媒体的报导方式促使了错误灾害认知形成。媒体还是各种社会势力互相竞争支配性意义的场域,在媒介组织、媒体工作者、社会文化工作者及利益集团的形塑下,灾害的“社会真实”(social reality)被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经过媒体再现的“灾害真实”是一连串“选择”过程的产物,虽然保留了部分真实面向,但其他面向则被有意识地排除(Williams,2003:320)。2011年8月艾琳飓风袭击了美国东部地区,新闻媒体的大幅报导引起全球瞩目,然而当艾琳到达纽约并减弱为轻度台风的热带风暴时,新闻圈夸张的报导手法与抢播行为引发了外界不断的批评。媒体报道并没有反映事实,而是过滤了想要的事实,集中报道一些他们认为是特定的议题,并让民众相信这些议题才是最重要的(Barnes,et al,2008:604-610)。

根据图6所示和命题1,媒体并没有正确扮演灾害报道的工具性角色,而是呈现了扭曲的灾难情境(Perez-Lugo,2004:211),媒体再现(representation)包含了偏见(bias)与刻板印象(stereotype),民众希望媒体清楚告知事实(telling the truth)、准确(accurately)反映灾害发生原因及呈现灾害过程真实图像,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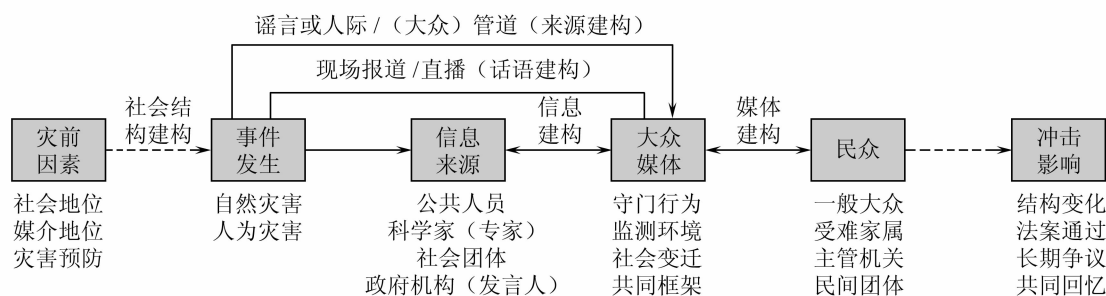


图6 媒体灾害报道的社会建构过程

在传播过程中煽情主义抬头、真实被埋藏、民众被有意识及有目的地欺骗(Frank,2006;Zwicker,2006)。美国 911 事件刚开始发生的三天内,电视新闻像是对一桩犯罪故事(crime story)的报道,三天之后,逐渐转向恐怖主义和维护国家安全等议题,从刑事犯罪摇身变成政治故事(political story),从个人的、死亡的伤痛情绪转化为全民的、团结的爱国氛围(McDonald & Lawrence,2004:327-340)。巴顿批评媒体经常会在符合自身喜爱政治议题上定义新闻并尝试控制社会意义的生产(Button,2002:146),从这个意义来说,电视是一种隐形的“灾难机器”(catastrophe machine)(Doane,1990:222-239)。

四、治理启示及政策意涵

在公众利益需求和价值取向日益多元化的今天,重大灾害的频频发生滋生了许多社会不稳定因素,社会建构主义不仅能为灾害研究提供新视角,还能对灾害治理理念、结构、策略和方法提供重要的启示意义(如表 2)。

表 2 社会建构主义视野下的灾害治理

离灾治理	离灾理念		离灾制度		离灾措施			
	离灾优于防灾 防灾优于救灾	与灾难共存 与自然共生	机动性灾难应变 计划离灾标准	离灾人员认 证制度	离灾建筑 离灾地下室	离灾避难所 离灾收容所	逃生道 路网	消防防 灾设施
非结构式减灾战略	非结构式减灾上升为 国家战略		变更土地使用 与管理理念		倡导资本投资 与改善计划			
	探索财政金融工具 防御策略		确立多层次灾害保险 分担机制		建立风险管理机制			
	推广社区减灾理念		加强灾害认知教育		建设灾害数据库			
风险治理	安全文化为基础		安全共同体为核心		“从容失效”系统为突破口			
媒体治理	注重形象管理		承担道义责任		加强“观念分配”			
	调整话语表述方式		把握现代传播规则		运用现代传播技术			
隐性灾民治理	灾民身份有效建构		合理界定灾民范围		特别重视隐性灾民			
不公平结构治理	改善灾区社会结构不平等				改善政治分配不公平			

(一)建构主义视野下长效“离灾”政策启示

建构主义认为错误的减灾、备灾和救灾方式是酿成灾害的主要原因,西方一些国家开始形成“离灾优于防灾、防灾优于救灾”的新灾害治理理念。离灾是指在确认灾害发生的前提下,坚守“顺应自然”、“与灾难共存”和“与自然共生”等理念为基础建构一套完整的灾害治理体系。离灾认为灾害损失增加原因大多来自人为过失,通过解构人类不当行为而对灾害采取自然应变的方式。在 2004 年印度洋海啸中,安达曼群岛是海啸冲击最为严重的地方,外界认为他们已经毁家灭族,几天后当印度空军派遣直升机去探个究竟时,竟然发现这些原住民几乎没有受到伤害,他们以极其自然的方式应对灾害,反而比那些拥有先进科学技术的军队和居民更能经受灾害冲击。防灾无法防止意料之外灾害的发生,离灾则能因为人们的合作而达到激励效果,在确保社会体系整体安全运行的基础上,即便意外灾害发生也能从容面对。它提倡离灾意识、建构永续社区及灾后重建恢复原貌等原则,通过制定离灾标准、离灾人员认证及机动性灾害应变计划等,同时配合修建离灾地下室、离灾建筑、离灾避难所、离灾收容所、逃生道路网和定位消防等设施,促使人类与自然、人类社会内部和谐共存而达到灾害治理的最佳效果。

(二)建构主义视野下非结构式减灾政策启示

建构主义强调人们需要打破结构式减灾“神话”与“迷思”,主张更多地从社会角度进行非结构式减灾治理,提倡从“工程减灾”向“社会减灾”、从“自然脆弱性”到“社会脆弱性”、从“管灾”到“管人”、从客观到主观、从“硬减”到“软减”、从“技减”到“人减”、从事后被动保护到事先主动防护、从“人定胜天”到“与灾害共存”、从刺激灾害潜在区域发展到抑制过度开发、从造成环境破坏到促进环境保护等重大转变,不仅符合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求,也是提高传统减灾体系效率的有效切入点(如图 3)。对于我国来说,通过将非结构式减灾上升为国家战略、变更土地使用管理理念、倡导资本投资改善计划、探索财政金融工具

防御策略、确立多层次灾害保险分担机制、建立风险管理机制、推广社区减灾理念、加强灾害认知教育及建设灾害数据库等措施,在社会发展与环境变迁之间积极寻找适应之道,才能最大程度减轻自然对社会的反扑及冲击程度。

(三)建构主义与风险治理启示

建构主义认为风险治理要实现政治、道德和社会目标并对产生风险的社会要素进行深刻反思,它需要突破传统的思维瓶颈,建立以“安全文化”为基础、“安全共同体”为核心及“从容失效”系统为突破口的新的治理模式。首先,“安全文化”是指通过风险沟通方式(risk communication)将风险告诉民众并调整其应对灾害方式,强调无论科学技术多么先进,总会遇到不可预测和不可抗灾害的发生,只有增加民众对灾害风险的真正了解并采取积极行动,才得取得灾害治理的理想效果。在卡特丽娜飓风中,由于布什政府风险管理能力不足,一场区域性自然灾害演变成包括经济稳定、社会安全和政府信誉的种种信心危机。其次,需要建立“安全共同体”。建构主义认为有效的灾害风险管理是通过共同体而不是权力实现的,政府部门和民间组织通过“公私协力机制”共担灾害风险,同时借助保险公司风险管理体系减少灾害对社会的冲击。最后,建构“从容失效”(fail gracefully)系统,这是灾害风险管理发展的新形态和新趋势,主张在面临压倒性灾害力量之前,建立当某一灾害超出所有可行性或可支付范围的弹性减灾系统。在2011年日本地震海啸中,政府在汲取经验的基础上,决定面对复合型灾害和“剩余风险”的出现而探索设立“从容失效”系统以降低灾害冲击。

(四)建构主义视野中媒体责任与灾害治理启示

灾害治理需要善于利用大众媒体对新闻传播深远的建构影响,充分发挥其积极功能而避免负面影响。首先,媒体应承担灾害传播道义上的责任(Klinenberg, 2002:15-16)。格累那达认为有效利用媒体可以服务地方社区、灾害工作者及更广泛的公共利益(Granatt, 1999:101-117)。布卡拉指出现代灾害管理已经把媒体当成伙伴,但通常由于媒体的独立性不太愿意成为其中一环(Burkhart, 1991:20)。其次,大众媒体“观念分配”能力加强。由于媒体对“灾害真实”建构发挥了多元、正面与负面影响交错在一起的影响力,媒体需要传递正确的灾情和救灾信息,同时帮助社会各界从中汲取教训以获得正确的防灾、减灾、救灾及离灾知识。再次,面对灾害例外情境的出现,媒体需要把握现代传播规则、利用先进传播技术和调整话语表达方式以满足民众了解信息及政府治理需求,同时又能符合市场责任、社会责任和新闻价值等不同层面的实践价值需求(Boykoff & Jules, 2007:1190-1204)。最后,人们常常质疑政治人物的救灾效率和救灾能力,政府官员迫于媒体压力从事无益于灾害治理的“救灾政治秀”,迫切需要通过媒体加强形象管理以摆脱“政治秀”和“泛政治化”质疑,媒体也要有意识避免类似情形的出现。

(五)重大灾害中“隐性灾民”治理启示

灾民的界定直接决定了政府和社会的治理范围,灾民概念是政府及法律系统建构出来的,灾民痛苦虽然直接、震撼与强烈,但常常利用国家赋予的灾民身份与基层政府博弈,通过“诉苦”和“告贫”等途径进行“有声”或“无声”抗争,以便索取更多重建资源。政府需要合理界定灾民范围,这样才能有效将灾害风险控制在灾区内而不至于扩散到灾区外,这是灾害治理重点所在。政府对于“受灾户”的认定标准是房屋全倒或者半倒、家有遇难者或者因灾致残者等,但“受灾户”不仅包括个人创伤,还包括“集体创伤”,整个社区居民心灵都受到了冲击,他们都是受创者或称为隐性灾民,都有可能受“次生灾害”的冲击。在灾害治理过程中,需要纳入这群常常被忽略、被遗忘和被建构的“隐性灾民”。隐性灾民还包括那些处于高风险区域的弱势群体,他们由于缺乏设备、知识和训练而同样对于灾害十分敏感,政府和社会需要在风险分析与评估基础上对这部分群体进行有针对性治理。

(六)不公平结构根源治理启示

政府需要对社会不平等和政治分配不公平进行全面治理,才能获得灾民、志愿者、捐助者和民众的认同。首先,政府需要从结构面入手,把灾害发生的结构性根源解除,才能缓解灾害带来的社会冲击,让社会重新回归正常。学者们虽然注意到了重建资源分配的不公平问题,但忽略了对社会不平等根源的研究。其次,建构主义认为资源缺乏、贫穷、边缘化和不平等因素是社会脆弱性形成的重要原因,社会阶

层越处于底层,受灾风险就越高,社会不公平是造成弱势群体易受灾害干扰的重要原因。再次,弱势群体身份可能重叠,即便是弱势群体也可能因为年龄、性别和族群等不同受灾风险而存在很大差异,但这种差异性往往被忽略了。最后,需要制定公平分配规则。政府在重建资源分配上具有很大主观判断成分,常被民众质疑为政治秀或私心分配等。施耐德指出卡特丽娜(Katrina)飓风暴露的最大问题就是美国政府没有明确目标与资源分配规则(Schneider, 2005: 515-516)。

社会建构主义通过研究人类社会与自然系统之间的调适过程,并且探讨这一过程对公共政策的意涵,有利于从个人主义和功能论传统方式向横向和纵深的现代治理方式转变。

五、小结：理论贡献与实践反思

在全球环境变迁、极端气候和自然灾害频发的威胁下,急剧变化的社会经济结构及复杂的社会技术系统(Socio-technical system)出现了“共灵现象”,探讨新的、有效的灾害治理方法已然成为政府、社会和学界共同关注的重大问题,社会建构主义则为之提供了“范式转移”及“反省机制”。其理论优势是比以往理论取向更具动态研究内涵,它将灾害视为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长期互动下的“常态”过程,反映了近年来欧美学术界在灾害研究上逐渐从分散走向整合、从单一视角迈向多元视角、从静态研究迈向动态研究的新趋势。例如,这一理论范式有利于进一步深入推动芝加哥热浪研究,克兰纳伯格曾提出了一系列令人反思的现实问题:为什么那么多人在热浪中孤独死去?为何他们不愿寻求街坊邻居的帮助?为什么在高温中这些人仍然紧闭门窗?为什么死亡率在不同社会群体和不同社区有着明显的差异?各种正式组织为什么在灾害面前是失败的?人们应该如何有尊严地活着?他从人口变化、文化演变、社会生态和社会网络等层面进行了回答,其实这些都可以纳入到社会建构主义框架进行统一分析,让人们时刻警惕社会机制对人类尊严的践踏和敷衍。同时,社会建构主义有助于将灾害研究从自然外部拉回到社会内部,通过将灾害危险源、发生原因及形成结果都视为灾害相关者、文化、媒体与科技团体等利益群体建构的,认为改变个人或社会应对灾害能力的历史、文化、社会和经济条件能降低灾害风险(Kreps & Drabek, 1996: 129-153)。它还有助于将人们从过去悲观受害者转为积极行动者,它不倡导“人定胜天”式的盲目乐观,而是提倡尊重自然规律及约束人类自身行为以主动适应灾害。人类通过不断反省人与环境、人与灾害、人与人之间的不当关系,把盲目、短视、不科学和不合理行为减少到最低限度,为人们重新认识灾害、定义灾害、呈现灾害并努力战胜灾害提供了勇气和信心,进而有利于从灾害中谋求生存到人类社会永续发展再到更加自信的生态现代化转向。

同时,它也存在一些明显缺陷,它在区分灾害内涵、类型、功能、应用及意义等方面并没有形成一套严密的理论分析框架,在实践中运用它也有着许多操作上的困难。而且相关的政策工具不易选择,难与现行法制整合或力不从心,运行效果也难以彰显和确定。对于灾害与社会互构过程如何呈现及互构机制如何形成等方面,它至今还没有给出明确有效的回答,导致在面对灾害困境时,学者、大众、媒体和组织领袖受各自角度和利益诉求的局限而产生“灾害迷思”现象。此外,它忽略了在地的社会群体从历史经验吸收灾害知识的事实,也使得灾害研究容易脱离现实并失去从这些传统知识汲取人类社会应对灾害的灵感。它偏重于地方社会与世界体系的互动关系及背后隐藏的权力结构,也容易化约为权力与政治的运作逻辑。最后,有可能导致对科学技术“滥用”的意识形态批判。这种激进的眼光容易导致灾害科技成为社会附属品的可能。灾害科技在实践中可能会出现“失灵”现象,但它对灾害治理所体现出来的重要价值和明显功能不能也不应否定。

尽管社会建构主义面临着上述挑战,需要在实践和研究中进一步探索和完善,但其所具有的巨大理论潜力和实践张力却是毋庸置疑的,通过原因建构、话语建构、观点建构、过程建构、表现建构和结果建构等六个维度初步形成了一套理论分析框架,突破了以往自然科学、功能主义与社会脆弱性等视角对灾害与社会互动关系分析的局限,极大地拓宽了灾害社会学研究视野,能促使人们审慎思考传统灾害治理的利弊,对于防灾、减灾和救灾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有利于在源头上扭转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关系日益恶化的局面。

参考文献:

- [1] 张 倩(2011). 牧民应对气候变化的社会脆弱性——以内蒙古荒漠草原的一个嘎查为例. *社会学研究*, (6).
- [2] 周利敏(2012). 社会脆弱性:灾害社会学研究的新范式.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3).
- [3] D. Alexande(1993). *Nature Disasters*. London:UCL Press.
- [4] M. D. Barnes, et al(2008). Analysis of Media Agenda Setting during and after Hurricane Katrina: Implications for Emergency Preparedness, Disaster Response, and disaster Policy.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98(3).
- [5] U. Beck(1992). *Risk Society: Toward a New Modernit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
- [6] R. Bolin & L. Stanford (1998). *The Northridge Earthquake: Vulnerability and Disaster*. London: Routledge. 1992.
- [7] M. T. Boykoff & M. B. Jules (2007). Climate Change and Journalistic Norms: A Case-study of US Mass-media Coverage. *Geoforum*, 38(16).
- [8] N. R. Britton (1986). Developing an Understanding of Disaster. *Journal of Sociology*, 22(2).
- [9] F. N. Burkhart (1991). *Media, Emergency Warnings, and Citizen Response*.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 [10] R. J. Burby (1998). *Cooperating with Nature - Confronting Natural Hazards with Land-Use Planning for Sustainable Communities*. Washington, D. C: Joseph Henry Press.
- [11] G. V. Button (2002). Popular Media Framing of Man-made Disasters: A Cautionary Tale. In S. M. Hoffman & A. Oliver-Smith (eds.), *Catastrophe & Culture*. Santa Fe, NM: 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Press.
- [12] S. L. Cutter(1996). Societal Vulnerability to Environmental Hazards.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47(4).
- [13] S. L. Cutter (2003). The Vulnerability of Science and the Science of Vulnerability.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93(1).
- [14] S. L. Cutter, B. J. Boruff & W. L. Shirley(2003). Social Vulnerability to Environmental Hazards.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84(1).
- [15] M. Davis(1998). *Ecology of Fear: Los Angeles and the Imagination of Disaster*. New York: Vintage.
- [16] M. Doane(1990). Information, Crisis, Catastrophe. In P. Mellencamp(eds.), *Logics of Television: 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17] K. T. Erikson (1976). *Everything In Its Path: Destruction Of Community in The Buffalo Creek Flood*. New York: Simonand Schuster.
- [18] R. Frank (2006). *The Greatest Story Ever Sold-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ruth from 911 to Katrina*. New York: Penguin Press.
- [19] M. Granatt(1999). Civil Emergencies and the Media: A Central Government Perspective. In Shirley Harrison (eds.), *Disasters and the Media: Managing Crisis Communications*. London, UK: Macmillan Business.
- [20] A. Hansen (1991). The Media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13(2).
- [21] K. Hewitt (1983). *Interpretation of Calamity: From the Viewpoint of Human Ecology*. Boston: Allen.
- [22] T. Ingold (1992). Culture and the Per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 In E. Croll & D. Parkin(eds.), *Bush, Base: Forest Farm*. London: Routledge.
- [23] R. E. Kasperson(1988). The 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 A Conceptual Framework. *Risk Analysis*, 8 (2).
- [24] U. Kivikuru(2006). *Tsunami Communication in Finland*.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1 (4).
- [25] N. Klein (2007). *The Shock Doctrine: The Rise of Disaster Capitalism*. New York: Metropolitan.
- [26] E. Klinenberg (2002). *Heat Wave: A Sociological Autopsy of Disaster in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27] G. A. Krep. & T. E. Drabek (1996). Disasters are Nonroutine Social Problem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ss Emergencies and Disasters*, 14(2).
- [28] G. A. Kreps (1998). Disaster as Systemic Event and Social Catalyst. In E. L. Quarantelli (eds.), *What Is a Perspectives on the Question*. London: Routledge.
- [29] Z. W. Kundzewicz (2002). Non-structural Flood Protection and Sustainability. *Water International*, 27(1).
- [30] I. R. McDonald & R. G. Lawrence (2004). Television News Coverage Following September 11.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48(3).
- [31] S. Ortner (1984). Theory in Anthropology since the Sixties.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26(1).
- [32] M. Perez-Lugo (2004). Media Uses in Disaster Situations: A New Focus on the Impact Phase. *Sociological Inquiry*, 74(2).

- [33] S. Schneider (1992). Governmental Response to Disasters: The Conflict between Bureaucratic Procedures and Emergent Norms,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52(2).
- [34] S. K. Schneider (2005). Administrative Breakdown in the Governmental Response to Hurricane Katrina,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65(5).
- [35] E. Singer & P. M. Endreny (1993). *Reporting on Risk: How the Mass Media Portray Accidents, Diseases, Disaster, and Other Hazards*. New York, NY: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36] R. A. Stallings (1998). Disaster and the Theory of Social Order. In E. L. Quarantelli (eds.), *What Is a Perspectives on the Question*. London: Routledge.
- [37] R. A. Stallings (2002). Weberian Political Sociology and Sociological Disaster Studies, *Sociological Forum*, 17(2).
- [38] K. J. Tierney (1999). Toward a Critical Sociology of Risk, *Sociology Forum*, 14(2).
- [39] K. J. Tierney (2007). From the Margins to the Mainstream? Disaster Research at the Crossroad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33 (2).
- [40] G. A. Tobin & B. E. Montz (1997). *Natural Hazards: Explanation and Integration*.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 [41] P. Udomratn (2008). Mental Health and the Psychosocial Consequences of Natural Disasters in Asia,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Psychiatry*, 20 (5).
- [42] D. Wenger & B. Friedman (1986). Local and National Media Coverage of Disaster: A Content Analysis of the Print Media's Treatment of Disaster Myth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ss Emergencies and Disasters*, (4).
- [43] K. Williams (2003). *Understanding Media Theory*. London: Arnold.
- [44] B. Zwicker (2006). *Towers of Deception: The Media Cover-up of 911*. Gabriola Island, BC: New Society.

Social Construction Approach and Disaster Mitigation:

A Sociology Study on Nature Disaster

Zhou Limin (Guangzhou University)

Abstract: Social construction provides us with an important approach and reflection mechanism for disaster, which includes two important study directions, six basic dimension and eight issues for disaster study. Elements of construction includes constructional subject, rules and discourse, which mainly discusses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ety and disaster. Logic of construction, the basic analysis frame, includes constructional process, performance and results. Therefore, there appears a series of important approaches for disaster mitigation, such as avoiding disaster, non-constructional mitigation, risk control, media responsibility, recessive victims and reasons for unfair construction. Such approaches possess theoretical advantages, namely dynamic study, from nature to society, from passive victims to active actors. But it also has some disadvantages, for example, lack of completed analysis frame, difficulties in empirical study, ambiguity of interactive construction process, uncl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oretical mechanism and logic, relationship between rights and politics, abus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r the purpose of politics.

Key words: disaster; social construction approach; functionalist approach; social vulnerability; disaster of sociology; disaster mitigation

■作者地址：周利敏，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Email: xplmxplm@sohu.com。

■基金项目：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13Y16)；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2BSH024)

■责任编辑：叶娟丽

